

价格上涨超时段收费 非学科类培训监管加码

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应纳入法治轨道

深一度

本报记者 赵晨熙 文/图

“未来非学科类培训是大势所趋，现在为您争取到最优惠价格，再不抓紧报名，价格还要涨。”

这位陈老师似乎所言非虚，记者调查发现，受“双减”政策影响，今年寒假一些校外非学科类培训价格有所上涨，有些涨幅甚至高达50%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双减”压缩了学科类培训机构生存空间，非学科类培训“趁机起势”，但不能任其野蛮生长，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强化监管。

非学科类培训市场寒假升温

五年级学生大满在北京市东城区某篮球培训营已连续报了两年篮球课，但今年寒假上课前，老师“劝”大满的家长杨先生再续点课，因为价格马上要进行调整，原来180元一节的篮球课要涨到250元，最终杨先生又为孩子续了20节课。

“双减”政策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在假期基本“凉凉”，非学科类培训被推上“C位”，涨价成了常规操作。记者随机采访了5名给孩子报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家长，其中有3人表示近期课程相较以往有了涨幅。

“老师直言不讳地说受到‘双减’影响，这类素质培训今后会更‘吃香’，以前价格是推广价，如今恢复‘原价’。”王先生的女儿在北京市东城区某舞蹈培训机构学习，现在每节课的价格比当初上涨了80元。

价格上涨伴随而来的另一问题就是超额收费。201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的费用。

但当记者以咨询者身份询问时，机构仍然推荐记者购买多课时。

“课程一年40课时，单课时300元，购买一年费用是10500元，合每节课260元。购买两年，每节课仅合210元，多买多划算。”海淀区某口才培训班的刘老师透露，目前机构内学员基本都是按一年起步。

当记者提出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的规定时，刘老师直言，如果按这个标准购买课时，就只能“走原价”。

对于坊间担心的非学科类培训以打擦边球方式进行学科培训等问题，在此次调查中记者并未发现。记者询问海淀区某国学培训机构，课程是否有助提高语文成绩时，老师表示，课程主要是为了培养孩子对文学历史的兴趣，并教授一些读书、记忆等技巧，并非教授学校教学内容，无法达到“提分”效果。

强化监管直指恶意涨价问题

在非学科类培训“蓬勃发展”的同时，相关部门也在强化监管，矛头直指价格过快上涨等问题。

1月30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专项整治工作。通知指出，随着非学科类培训市场营销急速升温，一些机构趁机涨价，倾销课时，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双减”成效，要全面加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不断巩固深化治理成果。

据教育部官网2月25日消息，截至2月15日，各地共排查非学科类培训机构18.48万个(次)，发现恶意涨价机构52个，相关违规问题已经整改，对相关机构进行了严肃处理，培训费恶意涨价部分已退还家长。

其实在通知印发的几天前，1月27日，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专门召开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头部大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会上，监管司相关负责人



2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某篮球培训课上，孩子们在练习打篮球。

指出，一些机构肆意涨价、过度营销的做法既背离教育公益性，又危害行业自身健康发展，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采访中，海淀区某篮球培训机构的丁老师向记者透露，春节前，相关部门曾对他所在区域内多家体育类培训机构进行检查，重点内容就是是否哄抬价格。

“先从体育类培训人手有一定针对性。体育考试分值在中考中逐步提高加之考试项目更丰富，使得体育类培训更受家长‘追捧’，价格涨幅也更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相比其他非学科类培训，体育类培训对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也最为明显，在分数和成长的双重因素下，体育类培训成为非学科类培训中的“热门”。

“一些机构之所以涨价，其实也与之前定价相对较低有关。”丁老师道出个中原委，“双减”推行前，家长们的投入基本集中在学科类培训，很多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只得打起“价格战”。

以丁老师所在机构为例，最初定价为3000元20节课，去除老师工资、场地租赁和学员保险等费用，利润并不大。今年寒假，机构虽涨为4000元20节课，但报名人数却提升很多。

在刘俊海看来，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拥有自主定价权，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适度提高价格，但如果涨幅过高则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会导致市场不良风气的蔓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也指出，如果机构在经营成本不增的情况下，涨价过高涉嫌过度逐利，既与教育公益性相背离，也会加重家庭培训支出负担，冲抵“双减”效果。

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把非学科类培训监管作为新的工作重点，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明确标准要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确保校外培训治理成效不打折扣。

四部门推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十四五”时期将支持200万户改造

本报 记者蒲晓磊 近日，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中国残联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十四五”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十四五”时期支持200万户特殊困难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教育部优化中职教育布局结构 将建成1000所国家级优质中职学校

本报 记者赵晨熙 “要让职业教育‘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在2月23日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指出，2022年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改革攻坚的关键年，要抓实抓好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要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大体相当，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普职分流”的关注。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建议取消中考后“普职分流”的观点，陈子季在发布会上对此进行了回应。

地方先行探索分类管理制度

“当前对学科类培训的政策收紧并不意味着对非学科类培训的‘放任’。”储朝晖说，一直以来，大家对学科类培训关注度更高，监管也更严，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学科类培训。事实上，国家出台的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政策，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同样要遵守，不得虚假宣传、变相涨价，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学费等规定都是不能逾越的红线。

其实早在2021年9月23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就释放了要严管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信号。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要研究起草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在组织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场所、培训内容等方面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机构同步作出规定。同时，要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立法进度，对非学科类机构管理一并纳入。

在培训机构涉及问题最多的预收费领域，率先进行了同步。2021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中就明确规定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也应全额纳入监管范围。

在储朝晖看来，与学科类培训相比，非学科类培训类别较多，明确主管部门进行分类管理是关键。

记者注意到，教育部近期发布的2022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指导各地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抓紧明确主管部门，实现常态化监管。

目前，浙江、天津等地已先行探索建立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管理制度。1月17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浙江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准入指引(试行)》，对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置、设施条件、从业人员、教学要求及培训材料、审批登记、资金监管

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13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被关停

本报 记者蒲晓磊 近日，民政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持续深入落实中央关于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决策部署，精准发力，有效打击，依法关停了2022年第一批13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及相关新媒体账号，清除了有关关联网站。

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制造业

近日，一条“没有50万彩礼，女朋友被强行拖走，我该怎么办”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迅速登上热搜。一时间，高价彩礼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长周世虹认为，高价彩礼是把婚姻异化为本买卖，把女性商品化，要解决这一不良社会风气，根本上还是要靠文明的进步和观念的改变，“因此，在推进婚俗改革时，既要积极宣传，也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推动人们完成思想观念的转变”。

刘俊海认为，明确机构设置门槛，标准有助于未来对非学科类培训市场进行“洗牌”，淘汰那些“作坊式”“游击式”的培训机构。

记者注意到，浙江发布的这份指引，虽明确培训机构必须经审批登记，办理许可手续后才能开展培训，但并未提及必须具有“办学许可证”。但在2018年出台的《意见》中规定校外培训机构必须经审批取得办学许可证后，方可开展培训。

在目前各地出台的政策中，针对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均未有“办学许可证”要求。但《天津市非学科类(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明确要求“具有办学许可证”。2021年8月，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坚决做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工作的通知》也要求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发放办学许可证。

业内人士分析，这是考虑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分管部门不同，比如，艺术类归文化和旅游部门管理，但部门并未有颁发办学许可证的权力。

“当前非学科类培训监管制度仍在探索期，各地政策不一可以理解。”但储朝晖认为，即便分类管理，也应保证机构的专业性，分管部门可以对机构的办学条件、师资等进行评估，但最终还是应由教育行政部门在办学许可证上把关。

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要推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立法，刘俊海认为这很有必要。

“地方政策先行，最终还是要出台国家专项立法，将培训机构监管彻底纳入法治轨道。”刘俊海认为，立法要明确学科类培训和非学科类培训概念和划分标准，明晰机构设置门槛和标准等，更关键的是要建立对培训机构老生常谈的预付费等问题的常态化监管机制。

破除陈规陋习推进乡村振兴 农村高价彩礼加剧结婚难生育难

农村高价彩礼问题，再次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2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推广积分制等治理方式，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庭家教家风作用，推进农村婚俗改革试点和殡葬习俗改革，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为婚后家庭生活埋下矛盾隐患

孙煜华在去中部省份进行调研时，当地一些农村的彩礼数额之高让他十分惊讶。“这里婚龄女孩非常吃香，哪怕是不识字，有一点残疾，男方要想把她娶回家，起步价也得是20万元彩礼。要知道，当地居民收入是不高的，农村地区更低，这也意味着，男方要掏空家里积蓄甚至借钱才能拿出这笔彩礼。”孙煜华说。

高价彩礼的现象，在沿海省份同样存在。孙煜华在调研时发现，在江苏淮安的一些农村，男孩多女孩少，“人丁稀为贵”的现象使得男方家里在博弈时有很高的筹码，选择余地很大，彩礼的价格也因此节节攀升。

观民生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农村高价彩礼问题，再次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

2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推广积分制等治理方式，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庭家教家风作用，推进农村婚俗改革试点和殡葬习俗改革，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这是继2019年和2021年之后，中央一号文件第三次对农村彩礼问题进行点名。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农村地区的彩礼数额较高，引发社会对于高价彩礼的关注。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煜华曾经多地对高价彩礼进行调研，发现高价彩礼是由城乡发展不平衡、性别比失衡、攀比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价彩礼抬高了一些农村地区的结婚门槛，会加剧结婚难和生育难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要通过发展乡村经济，推进婚俗改革等方式合力进行整治”。

破除陈规陋习推进乡村振兴

孙煜华在去中部省份进行调研时，当地一些农村的彩礼数额之高让他十分惊讶。

“这里婚龄女孩非常吃香，哪怕是不识字，有一点残疾，男方要想把她娶回家，起步价也得是20万元彩礼。要知道，当地居民收入是不高的，农村地区更低，这也意味着，男方要掏空家里积蓄甚至借钱才能拿出这笔彩礼。”孙煜华说。

高价彩礼的现象，在沿海省份同样存在。孙煜华在调研时发现，在江苏淮安的一些农村，男孩多女孩少，“人丁稀为贵”的现象使得男方家里在博弈时有很高的筹码，选择余地很大，彩礼的价格也因此节节攀升。

放眼全国来看，高价彩礼的现象并不少见。来自谷雨数据的一份2020“中国彩礼礼金地图”显示，浙江以183万元的平均值，远超全国平均值69095元，在所有地区中高居第一；黑龙江、福建、江西、内蒙古的平均礼金也都超过了10万元。

孙煜华认为，高价彩礼不仅会给农民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还会影响农民的养老问题和生育问题，“在农村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的保障水平并不是很高，一份高价彩礼，就要掏空长辈的钱包。农村养老问题会因此受到更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高价彩礼导致的结婚难，还会进一步造成生育难的问题，使得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低，对于形成合理的人口结构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高价彩礼背离了爱情的初衷和婚姻的实质，使婚姻演变成物质交换，甚至为婚后家庭生活埋下了矛盾的隐患。”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

刘俊海的观点，也被相关研究证实——谷雨数据的调查显示，超过四成家庭因彩礼礼金问题发生矛盾。

中央文件要求治理不良风气

对于高价彩礼问题，中央高度重视，多次点名强调要加强治理。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针对天价彩礼进行点名，要求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要“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地方的治理工作也在积极推进。2019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抵制天价彩礼作为移风易俗重要工作之一。

2021年4月，民政部将15个县(市区)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实验时间为期三年。同年9月，将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等17个单位确认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民政部将继续做好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加大对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力度。”民政部新闻发言人贾维周说。

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制造业

近日，一条“没有50万彩礼，女朋友被强行拖走，我该怎么办”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迅速登上热搜。一时间，高价彩礼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长周世虹认为，高价彩礼是把婚姻异化为本买卖，把女性商品化，要解决这一不良社会风气，根本上还是要靠文明的进步和观念的改变，“因此，在推进婚俗改革时，既要积极宣传，也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推动人们完成思想观念的转变”。

刘俊海建议，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的婚姻观，让婚姻回归本质，同时，地方政府要加以重视，把政府治理和群众自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成立移风易俗委员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对群众婚姻观进行正面引导。

孙煜华认为，除了性别比失衡、攀比心理等原因，城乡资源分配不均也是导致农村彩礼高的重要原因。

“由于现在资源多向城市集中，女孩也更多向城市的生活方式，对于婚后生活标准有较高的要求。这也意味着，农村的年青人需要经过更激烈的竞争，拿出更高的彩礼，才能结婚。”孙煜华说。

孙煜华认为，各地应当抓住乡村振兴这个机遇，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制造业，不仅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提升农民文化，还有利于吸引更多女性就业创业，减少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

“在发展乡村经济的同时，再结合宣传男女平等、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等举措，将有利于形成治理高价彩礼的合力，取得更好的效果。”孙煜华说。